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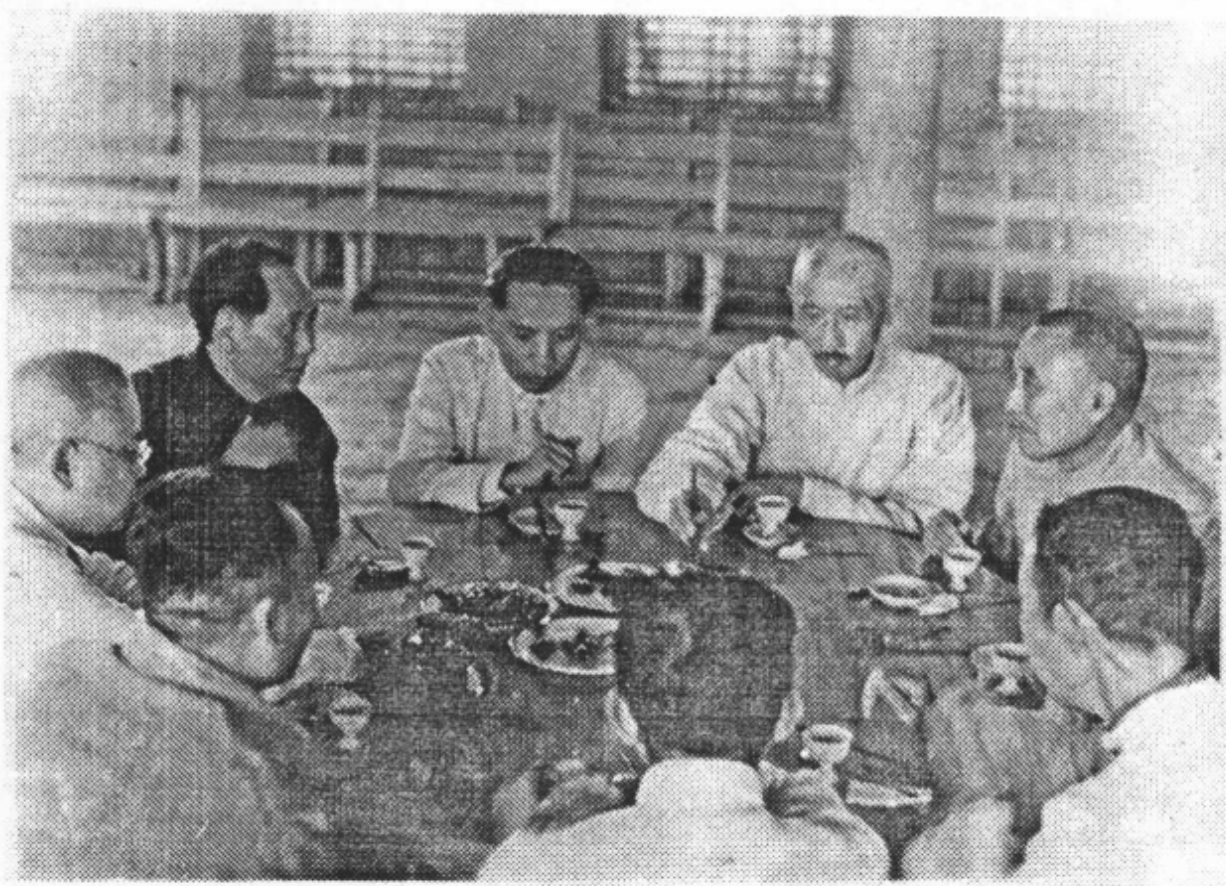
平齋

法漢人文苑都
 為感而張平子
 尤擅一代高名文
 史哲思固已抗常
 希賢星曆製農作
 以稱東京絕技
 吾友
 董廷魯先生今

之南陽賢也
 是於識蒼頡之
 奇文讀丘聚之
 瑋書發冢以求
 詩禮於孔丘之
 前推步而證合
 朔於姬曰之先
 使平子名空曰法
 未可畏矣何姑
 新屋不日成之願
 日平塵志所仰也
 嗚乎遠正則之休
 名遠去蹤蹟之
 妙思維之離亂
 去其興乎

民國十九年一月
 傅斯年拜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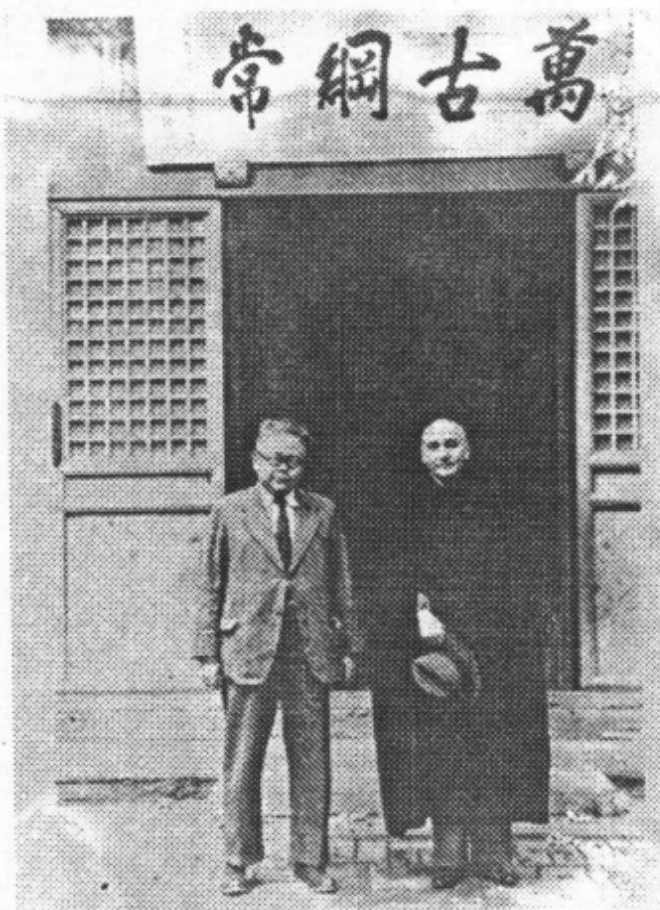
傅斯年手迹



毛泽东在延安宴请傅斯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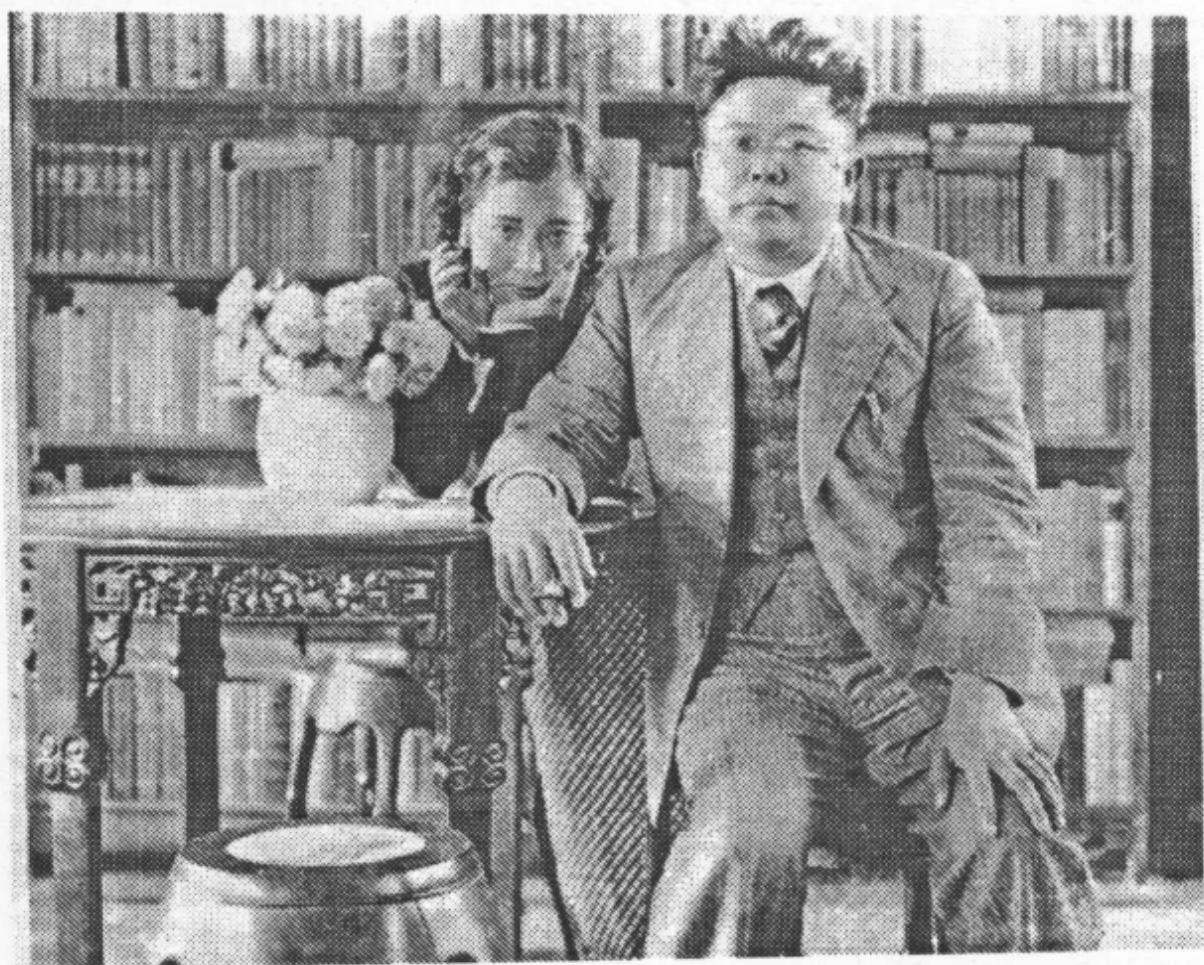
1946年，傅斯年及国民参政会六位议员赴延安。



1946年，傅斯年与蒋介石在北京合影



1913年，傅斯年初入北京大学时与其弟傅斯岩合影



1935年，傅斯年与夫人合摄于北平寓所书房

序

聊城地处鲁西，其南临黄河，地形上属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生活、奋斗，并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早在五六千年前，聊城属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接壤地带，两种文化的冲突、融汇，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近年发现的景阳冈城址可以为证。此后聊城的经济、文化一直长盛不衰。

悠久的历史、浓厚的文化底蕴也孕育并培养了一大批在历史上极有影响的知名人物。春秋时期，聊城为齐之西境，著名军事家孙臆“生于阿鄆之间”，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为齐恒公争霸中原立下了赫赫战功；齐燕争战时，鲁仲连于此射书喻燕将，以至后人“田单纵火牛记，一箭终输鲁仲连”之叹；其后则有建立后赵的石勒，盛唐名臣马周及宋代首释《伤寒杂病论》的著名医学家成无己等。

元代运河贯通后，聊城成为运河沿岸的重要商埠之一，有“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之誉，聊城的经济文化有了更为飞速的发展。明熹宗时，礼部尚书朱延禧被誉为“讲官第

一”；南京太常寺卿穆孔晖则堪称一代理学大师；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了名闻天下的“海源阁”藏书楼。万历二十二年，在平人朱之蕃首登状元第，其后则有“文章历代第一家”之誉的清首科状元傅以渐和康熙称为“文章平平，字压天下”的状元邓仲岳。

近代以来，由于运河漕运废弃，聊城的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但仍然涌现出一批极有影响的著名人物，如著名教育家“义丐”武训、著名学者傅斯年、抗日英雄范筑先、张自忠，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孙瑛等。特别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两离桑梓汗洒雪域，被誉为“当代的焦裕禄”。

“欲知来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为了进一步研究聊城文化，发展历史文化名城，我们编撰了这套历史名人系列丛书。

书中纰漏，望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3月

目录

序	1
一、求学生涯	1
1. 儒学世家	1
2. “五四”前后的傅斯年	3
3. 留学英德	7
二、学界名流	9
1. 学术活动	9
2. 史学思想	13
三、兼济天下	16
1. 力主抗日，反对投降	16
2. 评击时弊，批孔倒宋	17
3. 延安之行，力主和谈	19
附录：傅斯年生平著述简谱	22
后记	38

一、求学生涯

1. 儒学世家

聊城古称东昌，历为鲁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元朝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后，聊城凭借舟楫之利迅速发展，成为运河沿岸的重要商埠之一，有富庶甲齐郡之誉。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聊城的文化也有了很大发展，先后涌现出朱延禧、任克溥、傅以渐、邓仲岳等一批文化名人，并逐渐形成了几个以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傅氏即是其中之一。

聊城傅氏始祖名回，祖籍江西永丰，明朝成化年间曾任冠县县令，任满后携家眷南归，但有三子分别留居冠县、聊城、博平，聊城一支经逐渐发展，便是后来名震鲁西的聊城傅氏。

傅氏书香门第，子弟多精于学业，深为当地人所尊重，但直至清初傅以渐时，傅氏家族在聊城的地位才真正得以巩固并有所发展。傅以渐，傅回之七世孙，生于万历己酉年（1609年），少负才名，但由于明朝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傅以渐一直未取得任何功名。直到清入关后的1645年傅以渐才乡试中举，1646年又得中进士，殿试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首科状元，遂授宏文院修撰，历任内秘书院大学士、

国史院大学士等职，累迁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并曾先后被加封太子太保、少保，功名显赫一时。自此聊城傅氏便名冠当世，成为鲁西的名门望族。

傅以渐之后，傅氏子弟更是勤奋有加，科举得中功名者不乏其人。但及至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虽博通经史，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生未入仕途，兼之他不善理财，傅氏家境开始日趋衰落，到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时，则仅能靠教书所得的微薄收入维系全家生计。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便降生在聊城北关口渐残败的相府大院里。

虽然家道中衰，傅家并未放松对傅斯年的教育，他们寄希望他学业有成，以重振傅氏门庭。1901年春，尚不满5周岁的傅斯年便被送入当地名师孙达宸的学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傅斯年天质聪颖，加上他勤学强识，学业在同龄人中一直出类拔萃，十岁时便已通读十三经，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虽然1905年傅斯年被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但其时所学仍如在旧式书院一般，仍以读经、作八股文为主，新知识甚为了了，这种情况直到1908年傅斯年离开聊城去天津求学时仍未有所变化。

童年的傅斯年被八股文化所包围，接受的主要是传统教育，接触的也主要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经典。对于这段经历，傅斯年是持批评态度的，如他后来所说：“我小时候，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的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不过，也应该看到的是，这八年的传统教育也使他在国学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培养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在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与这段经历也是不无关系的。

2. “五四”前后的傅斯年

1908年，傅斯年跟随他父亲的学生离开聊城，去天津卫读书，也开始了他人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在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三年多的求学生涯中，傅斯年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系统地学习了物理、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学习了英语，同时也接触了大量新式书刊，这使他拓宽了知识视野，提高了思想境界，为他后来继续深造与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3年，傅斯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当时的北大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侧重自然科，乙部则侧重文史诸科。1913年预科毕业后，傅斯年旋即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即后来的中国文学系。

傅斯年初入北大时，正值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尊孔复古思潮大行其道，所以当时从课程设置到课程内容都依然未脱旧国学的窠臼。在当时众多的国学门派中，傅斯年极为尊崇的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傅斯年家学渊源深厚，文史功底扎实，加之心仪国学已久，所以一经接触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很快也得到了古文经学派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的重视与厚爱，他们希望傅斯年继承古文经学派的衣钵，使之后继有人，并发扬光大，所以傅斯年升入本科后不久便成了他们的得意门生。如果不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春雷惊蛰，傅斯年肯定会顺着既定的道路走下去，最终成为国学大师，成为古文经学派的遗老遗少。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出版了《青年》杂志（不久更名为《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首倡文学革新，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1月《新

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打响了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与之同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针对尊孔复古思潮仍在泛滥的情况，他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接着他又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同年，《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北京，北大文科的进步学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成为主要撰稿人，北大由此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唤醒了傅斯年，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他很快接受了西方的社会进化论与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实用主义哲学更是倍加赞赏。傅斯年经常旁听胡适讲课，并常和罗家伦等人去胡适家请教和讨论各种问题，傅斯年与胡适也从此结下了半师半友的亲密关系。此外，傅斯年还节衣缩食，购买、阅读各类进步书刊，尤其是西方书籍。新知识、新思想启迪了傅斯年，促使他开始以新的思想观点读书、听课，很快便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文学革新申义》，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其后又相继发表了《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谬误》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观点进行了阐释，而且加以补充发挥，提出了一些极有新意的见解，对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也因之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1918年12月，为了配合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傅斯年与罗家伦、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傅斯年被推举为主任编辑，并于1919年1月1日出版了《新潮》杂志创刊号。在创刊号上，傅斯年发表了《〈新潮〉发刊旨趣书》，指出创

办《新潮》的目的是“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代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的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新潮》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成为鼓吹文学革命的著名刊物，影响颇大，销量常在一万五千份左右。《新潮》的创办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其中傅斯年的功劳尤大。

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另一场声势更为浩大、影响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五四”运动突然爆发了。作为新文化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去，参加并直接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为处置战败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权益，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所谓的“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中国向和会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取消列强在华特权；（二）取消“二十一条”；（三）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占的山东主权。但是和会拒绝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居然在对德合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和会”成了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顿时群情激愤，5月3日北京各界分别集会，其中尤以青年学生最为激进。5月3日晚，千余名北京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集会，并通过了如下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拒绝和约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另外会议还决定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学界大示威，并推举起20名学生代表负

责组织事宜，傅斯年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色表现而名列其中。

5月4日上午，20名学生代表继续开会，商讨集会，示威路线等，此次会议由傅斯年主持。会议最后决定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集合，然后整队去东交民巷游行，向各国使馆示威。下午1时许，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千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而后在游行总指挥傅斯年的率领下，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在东交民巷口，游行队伍受到外国巡捕的无理阻挠，反复交涉仍不得通过，学生们愤慨异常，在傅斯年率领下又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曹宅大门紧闭，有学生跳墙而入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入，因不见曹汝霖，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赶来对学生进行镇压，并逮捕了32人，傅斯年因离开现场较早而免于被捕。5月5日，傅斯年因故与同学发生争吵，终至动武，盛怒之下，他宣布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了，从此傅斯年就脱离了学生运动。1919年6月，傅斯年本科毕业，旋即参加了出国考试，并被录取为官费留学生赴欧学习。

“五四”前后这个时期是傅斯年一生中的闪光点之一。在这个时期，傅斯年接受了新思想、新知识，并且顺应时代潮流，以蓬勃的朝气和非凡的才干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作为学生领袖，直接参与并领导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的是，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由于思想上的分歧，傅斯年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关系日趋疏远，与胡适的交往则日见密切，由于受胡适的影响，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接受了胡适“撇开政治”、“只谈文

化”的主张，这也是他最终脱离学生运动的思想根源和主要原因。

3. 留学英德

1919年傅斯年考取了山东赴欧留学生。1920年1月2日，傅斯年等人由上海乘船出发，2月末抵达英国的利物浦，次日到达伦敦。

到达伦敦后不久，傅斯年便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兼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作为一名具有深厚文史功底青年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主要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科学”主要是提倡西方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提倡科学的思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社会问题，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宣传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这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同时输入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进而形成了一股科学热，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傅斯年更是深受影响，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也激励着傅斯年积极探索强国之路，从而对科学寄以厚望，这也是他赴欧留学的主要原因之一。1920年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近日温习化学、物理学，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他当时对科学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傅斯年对英国的文学、史学、哲学亦颇有兴趣，广泛阅读各种著作，对萧伯纳的戏剧，几乎每本都看过。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大学，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据罗家伦回忆，傅斯年离英赴德：“一方面受柏

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学习的朋友们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所谓两种学术空气是指当时柏林大学有两门学科最引人注目，一是近代物理学，其中主要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二是语言文字的比较考据学。除了认真学习这两门学科外，他仍像在英国时一样，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在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虽多，但用功读书者较少，其中以陈寅恪、傅斯年读书最为刻苦，被人戏称为“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在英德留学初期，傅斯年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兴趣甚浓，但由于童年时即已培养起的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使他的专攻方向很快又回到历史上来，但这时深深吸引着傅斯年的已不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学派，而是朗克的实证主义学派。朗克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是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人。他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资料一条路可走，他的历史观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为史料学。这种史学理论对傅斯年的影响是极深的，回国时，他曾自称是中国的朗克学派，而后更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口号。

自1920年离开中国，到1926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近七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潜心学术，虽未取得任何学位，但却真正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接受了新思想，使他成为学术界为数不多的通才。更为重要的是，朗克学派的理论深深影响了他，使他发现了西方学术和中国传统学问的联接点，为他后来回国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作好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二、学界名流

1、学术活动

1926年冬，受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之邀回国，12月受聘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兼任文科学长（后改称学院院长），即国文、史学两系主任。

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文科学务后，先后聘请了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等著名学者到中山大学任教，充实了师资。1927年秋，他与顾颉刚等人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出版《研究所周刊》，并招收研究生。在《周刊发刊词》中，傅斯年提到创办研究所的目的是“实地搜罗资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中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集风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具体地讲就是发挥集体优势，整理学术资料，为语言学、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丰富新颖的资料。这种思想贯穿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促使他积极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为院长，并聘请了30名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傅斯年为筹备委员之一。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决定先

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即社会学）研究所、地质学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可见其最初研究方向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与传统的学术有根本的区别，它使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可以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所以他极力向蔡元培陈述此两项工作的重要性，建议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3月，中华民国大学院聘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4月10日国民政府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为独立的研究机关，蔡元培出任院长。不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广州中山大学内。同年夏，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专司筹备工作。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宣告正式成立，傅斯年以专任研究员兼所长职务。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史语所虽曾数次迁徙，傅斯年也曾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但他始终兼任史语所所长，直至去世，可见他对史语所的感情之深，他的学术活动也主要是在史语所进行的。

早在史语所成立前的1928年5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在该文中，他明确提出创办史语所的目的“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而其研究方向应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扩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在文章的最后，他提出了三个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

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史语所同仁正是在这几个口号的鼓舞下遵循着这几项原则而展开工作的。

傅斯年最初拟定计划，准备在研究所内设九个组，其中历史组五个（文籍考订组、史料征集组、考古组、人类及民俗组、比较艺术组），语言组四个（汉语组、西南语组、中央亚细亚组、语言学组）。1929年6月他又对原计划作了调整，将上述九组合并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主任。各组成立后迅速展开工作，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里，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历史组的工作重点是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汉简及敦煌材料，其中尤以整理大库档案为主。清内阁大库档案是指清朝政府存放在内阁大库中的各种档案资料，计十万余斤，这些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傅斯年梦寐以求的直接史料。20年代初这批档案被装入麻袋，当作废纸处理。史语所成立后，在傅斯年的努力下，这批档案由中央研究院购入，交史语所保存整理。1929年9月史语所成立了“明清史料编刊会”，傅斯年、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5人为编刊委员，并聘请20余人进行整理。自1931年起先后出版了《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编三十册，后因抗日战争爆发遂告停顿。1930年在整理档案时，他们发现了明朝内阁进呈《熹宗实录》的散页，而世存《明实录》正缺《熹宗实录》13卷，傅斯年想从散页中找出所缺部分，并对世存《明实录》进行校勘，于是又制定了校勘《明实录》的计划，他聘请明史专家李晋华主持校勘工作，而且还亲自校勘了《太祖实录》36卷。

此外，史学所的学者们还对敦煌卷子、汉魏竹简进行了整理研究，并刊行有《敦煌劫余录》、《敦煌缀琐》和《居延汉简考释》等。

考古组的工作重心是田野考古发掘，主要成绩则是安阳殷墟的发掘。1928年8月，史语所尚在筹备之际，傅斯年便派董作宾到安阳进行调查，1929年就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考古组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先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确定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尤其是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安阳殷墟外，考古组还对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等进行了发掘。

语言组的工作成绩虽不如历史组、考古组引人注目，但也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傅斯年摆脱了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方法的束缚，聘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学家，用科学的工具、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语言学。语言组曾组织人力，对南自两广、北至河北、东起福建沿海、西到川陕一带的十四个省区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对边疆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了采集，作了录音。此外语言组还在南京建立了语音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

史语所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是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据统计，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二十多年里，史语所共印行各种专刊30种，单刊25种，集刊22种，《史料从刊》7种，《中国考古报告集》2种，《人类学集刊》2卷，共刊布论文500余篇。二是开拓了学术领域，破除了传统的研究方式，开辟了史料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研究领域，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同时

也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作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为史语所的发展殚精竭虑，功不可没。

除了担任行政职务，领导史语所开展各项工作外，1927—1936年这十年间，傅斯年还积极投身学术研究，先后撰写了《性命古训辨证》、《东北史纲》两部学术著作，发表了《大东小东说》、《夷夏东西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等十余篇学术论文。此外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时还写有《中国古代文学史》、《史学方法导论》、《史记研究》等讲义。数量虽说不多，但多是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史学思想

傅斯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是近代学人中少有的通才，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现代学术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研究傅斯年，不能不研究他的学术思想，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对其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史学思想作简要概述。

傅斯年家学渊源深厚，自幼受传统文化影响极深。在北大学习时，刘师培、黄侃等人对他厚爱有加，这使他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有深刻细致的了解。后来他又留学英德，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对朗克的实证主义学派更是深得其精髓，这使他能集中西文化于一身，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史学便是史料学”，他反对传统的由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式，反对搞“化石的史学”，而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整理史料，认为历史学完全可以建设得如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科

学，从而将史料学在历史学中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时期，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在史学界，各种资产阶级的史学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都迅速得以传播，客观上需要大量新颖的史料。而我国故有的史学传统忽视材料的收集整理，基本上是本着从文献到文献的方式进行的，传统的史书编纂尤其如此，这种史学传统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史学界破除旧史学，创立现代新史学的呼声日益高涨。傅斯年正是顺应这种时代要求，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主张的。

傅斯年认为要建立现代新史学，必须“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作客观的史料学”，“由人文的手段，变作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使史学向“求真”、“求实”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的史学才会日益进步，赶上世界的发展潮流。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扩张研究材料”，他认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进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进而提倡全面搜集各种历史资料，即是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到的“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且在史料的整理使用过程中要有客观的态度，主张让材料自己说话，他说“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种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准备好，则事实自然很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材料便不出货……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

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除去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之外，他还提倡“扩充工具”，即是用历史比较法、自然科学方法、语言学的方法等来治史，其中他最为推崇的是历史比较法，他曾说：“假如有人问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会回答说：‘第一要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虽然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但他并没有把史学和史料学完全等同起来，尤其是这个口号中的“史学”指的是单纯的史事研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曾将“史的观念”、“著史”和“史学”三个概念作过明确区分，对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切忌望文生义。但他把史料学的地位提高到不合适的高度，认为历史学中唯一可称得上科学的是史料学，在史学研究中导致了重史料、轻史观，重考据、轻思辨的不良倾向，不能全面、历史、发展地看待问题、处理问题，难以发现历史事物、现象的本质及内在联系。

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一经问世，就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褒贬不一。但从总体上看，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基本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学术发展的产物。他的史学思想对于纠正传统学术的弊端，创建中国的史料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思想既便是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是不无裨益的。也正是在这种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傅斯年创办了史语所，并提出要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史语所展开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发掘工作，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三、兼济天下

傅斯年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同时也是著名的爱国者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后，傅斯年因深受胡适“撇开政治”、“只谈文化”的主张的影响，曾一度醉心于学术。自欧回国后创办了史语所，在学术研究上也做出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但是时局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特有的时代责任感使他不可能也不能埋头书斋，家事国事事事都要关心，以他学界名流的影响为国家和民族积极奔走，作出不小的贡献。

1. 力主抗日，反对投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但当政的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寄希望国联主持公道，让日本顺利占领了东三省。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后大造舆论，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妄图使其占领合法化。为了驳斥这种谬论，教育国人，增进国人对东北地区历史的认识，傅斯年联络徐中舒、肖一山等人准备写一部东北通史，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写成了第一卷，名为《东北史纲》。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中广征博引，从民族学、语言学的角度，用大量的原始记载和各种史料，详细证明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后来他

又让李济把这本书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以供参考。撰写《东北史纲》是傅斯年“书生报国”的一次具体尝试，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在《东北史纲》的引语中他还说：“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表达了必胜的信念。

为了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阴谋，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士气与信心，反对妥协和投降。1932年春，傅斯年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在北平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以“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呼吁人民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在五年的时间里，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揭露日本的阴谋，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投降，制造舆论，鼓吹抗日。

傅斯年除了以《独立评论》为舆论阵地，不断著文宣传抗日外，在实际行动中，他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爱国热忱，旗帜鲜明地反对妥协投降。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答应了妥协卖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把察北、冀东的许多权益出卖给了日本，傅斯年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而被傅斯年目为半师半友的胡适却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进行辩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傅斯年看后大为恼火，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社，并与胡适断绝关系，后经丁文江出面调解，才与胡适恢复了关系。1945年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在北大复校过程中，他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两次发表声明，坚决清除伪北大的教职人员，保持了北京大学的纯洁性，同时也表现了傅斯年的民族气节和鲜明的的是非观。

2. 评击时弊，批孔倒宋

傅斯年虽然视国民党政权为正统，但他对统治集团中存在着严重腐败现象深感忧虑，极为不满，不时著文或发表言论评击时弊，以澄清内政。为了在批评现实时保持超然的态度，他始终恪守“参政而不从政”的原则。1938年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设立了国民参政大会，傅斯年连续四届被选为参政员，并被选为第一届一二三次大会、第二届一次大会、第四届一次大会驻会委员。在任参政员期间，他积极发表政见，献计献策，同时不断批评现实政府的弊端，同各种腐败势力作斗争。他不畏权贵，敢说敢为，对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政界显要也毫不留情，从而被人称为傅大炮。

孔祥熙、宋子文都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是蒋介石政权的 core 人物，且均为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在他们任行政院长期间都曾遭到傅斯年的猛烈抨击，并因此先后下台。

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前，曾多年担任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代理院长，这期间他利用职权大肆贪污。1938年1月他被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当即招致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傅斯年更是立即上书蒋介石，列举大量事实，力陈孔祥熙不能胜任行政院长，但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1938年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期间，傅斯年再次上书蒋介石，仍未有任何效果。但傅斯年并未因此罢休，继续搜集有关资料，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上对之进行公开揭露。随着孔祥熙的丑行不断被揭露，特别是美元公债案的暴露，掀翻孔祥熙的时机已经成熟。1944年国民参政会举行期间，傅斯年不顾陈布雷等人的阻拦，在9月7日公开针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对此，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只得免去了孔祥熙的一切职务。

1945年6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最初，傅斯年对宋子文抱有一些幻想，尤其《黄金献金条例》着实迷惑了傅斯年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子文的贪婪面目暴露无遗，傅斯年对其态度也由支持变为反对，1945年10月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子文去年还好，今年得志，故态复员，遂为众矢之的……熬过了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

在宋子文的主持下，又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稳定经济的《管理外汇暂行办法》、《黄金买卖细则》、《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等，借机大肆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仅以套购外汇一例，据国民党官方报纸《中央日报》透露：仅1946年3月—11月间，中央银行共抛出政府牌价外汇38115万多美元，其中宋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套购15337万美元，孔氏家族控制的扬子公司套购18069万美元，两家合计套购33446万美元，占总额的88%左右。这严重扰乱了国统区的经济稳定，并最终导致了席卷整个国统区的“黄金风潮”，宋子文的所作所为也遭到各阶层的一致反对。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①一文，对宋子文进行猛烈抨击，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1947年3月1日，宋子文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

3. 延安之行，力主和谈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在华政策，以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则以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共势力再次抬头。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政策重点

由对外抗日转为对内反共，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先后在山东、湖南、山西等地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根据地广大军民的坚决斗争下，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但国民党政府并不甘休，1941年1月6日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再度紧张，抗日统一战线面临分裂，使广大爱国人士深感忧虑。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一致抗日，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通过提议，决定“组织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傅斯年等5人被推荐为视察团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视察团没有立即成行。

1945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对抗战胜利后中国何去何从，国共关系如何发展忧心忡忡。傅斯年等再度商讨访问延安，为国共和谈，团结抗日进行斡旋，并取得了一致意见。6月2日，傅斯年、褚辅成、黄炎培、冷遹(yù)、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等七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出访问延安，促成国共和谈，以便团结、抗日的主张。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傅斯年等，欢迎他们访问延安。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未成行外，傅斯年等人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欢迎。

视察团成员在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天半的会谈，最后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两点共识：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并将会谈内容写成《延安会谈记录》。此外毛泽东还单独邀请傅斯年谈了整整一个晚上。7月5日傅斯年等人回到重庆，7月7日会见了蒋

介石，汇报会谈结果，并将《延安会谈纪录》递交国民政府。但蒋介石政府很快又发动了内战，傅斯年和平统一的愿望化为泡影，但他为国共两党合作而做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傅斯年是一名学者，但他始终没有远离政治，他“以天下为己任”，在参政不从政的原则下，利用在野的身份，为国家和民族积极奔走，充分展现了他作为爱国者的一面，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他始终视蒋介石政权为正统，虽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本质有一定的认识，但他始终没有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因而他的社会活动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局限性，他的政治理想也就不可能得到实现。

附录：

傅斯年生平著述简谱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岁

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省聊城市北门内祖宅。

傅氏为聊城名门望族，傅斯年七世祖傅以渐为清代开国第一科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以后官宦不绝，书香传家。

1901年——1903年（光绪二十七——二十九年）6——8岁。

1901年春，入聊城孙达宸之学塾，平时祖父课读在家。

1904年（光绪三十年）9岁

在私塾读书。是年5月，父卒，享年39岁。

1905年——1907年（光绪三十一——三十三年）10—12岁

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3岁

随侯廷焯去天津读书。

1909年（宣统元年）14岁

是年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系统学习了物理、化学、数学等知识，并接触大量新式书刊。

1911年（民国元年）16岁

与聊城县乡绅丁理臣长女丁毓翠女士结婚。

1913年——1915年（民国二——四年）18—20岁

1913年夏，傅斯年中学毕业，随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当时北京大学分本科、预科，预科又分甲、乙两部，甲部偏重自然科学，乙部偏重社会科学。傅斯年在预科学习成绩优秀。

1916年（民国五年）21岁

在北大预科毕业随即升入本科国文门，初入本科时，崇信章太炎学说，受到北大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等人的器重。

1917年（民国六年）22岁

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采取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带有新思想的学者先后去北大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傅斯年很快脱离了传统国学的束缚。

1918年（民国七年）23岁

①约集同学创立新潮社，并创办刊物《新潮》，傅斯年出任主编。其主要成员有：

罗家伦，字志希，是傅斯年当时最好的朋友。任编辑，毕业后曾留学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回国参加国民党，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驻印度大使等职。

顾颉刚，在大学三年级时与傅斯年同一宿舍，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另外还有毛子水、俞平伯、康白情、何思源等人。

②傅斯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文章有：《文学革新申义》、《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谬误》等文章。

1919年（民国八年）24岁

①1月，《新潮》第一期出版，《新潮》是继《新青年》以后第二个鼓吹文学革命的刊物。傅斯年曾声明，《新潮》杂志登载的文章全部是语体文，不登载文言文。选择文章的标准很严，因此，《新潮》在当时很有影响，第一期就复印三次，销售一万三千多册，以后一直保持一万五千多册。

②“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为北大领袖之一，又被推为学生游行总指挥，亲自扛着大旗率领学生队伍到赵家楼，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不久，因某些原因退出了学生会。

③夏，在北大毕业，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

④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43篇，最主要的有《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万恶之源》等。

1920年（民国九年）25岁

①一月到达英国，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入伦敦大学从史培曼（Spevornor）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以便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进而研究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在研究实验心理学的同时，也涉猎英国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等学科。

②发表文章有：《寄同社诸兄》、《阴历九月十五夜登东昌城》、《自然》等篇。

1921年——1922年（民国十——十一年）26—27岁

继续在伦敦大学学习研究。其祖父于1922年去世，终年78岁。

1923年（民国十二年）28岁

秋，由英赴德。据同学回忆，傅斯年赴德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柏林大学学术空气的影响：当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和著名的语言文学比较考据学都紧紧的吸引着傅斯年。二是受他的好友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

陈寅恪，江西义宁人，祖父陈宝箴，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是维新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其父陈三立，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陈寅恪曾留学日本和欧美，精通十几种外语，由博返约，成为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

俞大维，陈寅恪的表弟，后成为傅斯年的内兄，博学多识，是著名弹道专家，回国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等职，因和蒋经国为儿女亲家，至今在台湾军政上层仍有影响，陈、俞两位都是傅斯年的挚友。傅斯年到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傅斯年此时继续保持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学习方法，除学习相对论，比较语言学，还学习研究德国哲学、历史、地质学、力学等课程

1924年（民国十三年）29岁

①5月会晤由美国路经德国的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据杨步伟回忆，就他们在柏林所见，当时最刻苦学习的留学生就是孟真和寅恪，他们俩专心致志，就象“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②祖母陈太夫人在家乡去世。享年80岁。

1925年（民国十四年）30岁

继续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研究，并经常与陈寅恪、俞大维等人讨论，切磋学术，先后会见了毛子水、罗家伦、朱家骅、段锡朋等老同学。

1926年（民国十五年）31岁

①9月，胡适到法国考察，傅斯年特从德国到法国与之会晤，两人同吃同住，白天去巴黎法国图书馆看敦煌的卷子，晚上讨论社会学术问题。傅斯年提出：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从民间起来的时候是“生”，然后象人的一生一样，由壮年而老年而死亡。胡适自称：“这个观念影响我个人很大。”

②冬，由德回国，返里探亲。

③12月接受广州中山大学朱家骅邀请，携弟斯巖（孟博）去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历史两系主任，为学生开设了《尚书》、《古代文学史》、《陶渊明诗》、《心理学》等课程。

1927年（十六年）32岁

①秋，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同时创办了一个周刊，在发刊词中提出：要实地搜集资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②在语言历史研究所发表文章有：《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世界之想象》、《论孔子学说之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对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1928年（民国十七年）33岁

①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先生担任院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所筹备委员。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建立。傅斯年被聘为所长，所址设在广州。

傅斯年明确提出了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目的和方向。指出：“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所以，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方向应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扩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并对研究方法作了具体阐述。一些学者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面的内容决定了以后的时期史学研究应走的路线，至今日还没有什么重大的修改。”

②领导研究所考古专家进行了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傅斯年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1928——1937年十年间，他领导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虽然具体挖掘由董作宾、李济负责，但傅斯年负责各种事务性工作，包括解决与河南地方发生的纠纷，排解挖掘中的各种困难等。

安阳挖掘发掘了大量殷代铜器及甲骨文，通过对这些铜器和甲骨进行研究和鉴定，使商代史事日趋明显，从而使中国信史向前推进数百年。同时，安阳挖掘的收获成为中国3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③傅斯年发表论文与论著有：《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国古代文学史训义》《诗经讲义稿》、《战国子家叙论》、《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周颂说》等。

这个时期，傅斯年重点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并多有创获，是他学术研究的主要时期。

1929年（民国十八年）34岁

①春，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北京。所址在北海养心斋，傅斯年除任史语所所长和研究员外，开始兼任北京大学教授。

②9月，为购买明清大库档案多方活动。明清大库档案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原始记录，是研究明清历史的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历史博物馆却作为废品处理，罗振玉辗转买到，后又转卖给李盛铎，李盛铎打算再转卖。傅斯年通过和胡适、陈寅恪商议决定买下进行整理研究。于是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要大学院出款购买，转赠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专门成立了整理的领导班子，由陈寅恪，徐中舒负责。明清大库档案的抢救与整理使明清史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亦是当时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1930年（民国十九年）35岁

①主持研究所事务，兼在北京大学上课。

②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其它刊物发表之论著有：《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姜原》、《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明清史料发刊例言》、《安阳发掘报告》。

其中前四篇是傅斯年对古史研究、考证的论文，《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安阳考古发掘情况。

《明清史料发刊例言》则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的序言和凡例，为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整理制订了几项基本原则，同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1931年（民国二十年）36岁

①4月底，傅斯年从北平到安阳小屯，视察殷墟发掘情形，同考古学者共同生活了三天。

②“九·一八”事变爆发，激发了傅斯年强烈的民族意

识和爱国热情，他走出了书斋，一方面帮助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稳定学校局势，教育学生抗日爱国；一方面设法激发各方面人士的爱国热情。在北平图书馆召开的各届人士座谈会上，傅斯年慷慨陈词，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命题要大家讨论。并决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教育国人。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37岁

①在主持史语所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工作，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周刊，不断在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抗日。

②为驳斥日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傅斯年联合徐中舒、蒋廷黻等人编写了《东北史纲》，提供了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全书的主要部分由李济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调查团以为参考，受到调查团的重视。

③在《独立评论》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的主要论著有：《邮政罢工感言》、《监察院与汪精卫》、《日寇与河北天津》、《“九·一八”一年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等15篇文章。

文章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时局的议论，鼓吹抗日救国。二是探讨学校教育，其中《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再谈教育问题》都属于这一类。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8岁

①领导史语所迁到上海，但仍在北京大学兼课。并从这一年开始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所长及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后来才改由李济担任。

②在《独立评论》发表的文章有《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

了》、《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等，都是针对时局发表的评论。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39岁

①傅斯年由于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对所谓国粹的中医理论甚为反感。他在《大公报》发表了《所谓国医》的文章，对中医理论进行严厉的批评。以后在国民参政会上再次提案，要根除中医。其态度有些偏颇。

②在这一年与原配夫人丁氏离婚，同年8月5日与俞大綵在北京结婚。俞大綵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语，其兄俞大维与傅斯年为同学好友，经俞大维介绍与俞大綵结识。

③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独立评论》、《大公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论著有：《周东封与殷遗民》、《城子崖序》、《“不懂日本的情形”》、《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再论所谓国医》等11篇文章。其中有些是对时局的评论，《周东封与殷遗民》是学术论文，《城子崖序》是城子崖发掘报告的序言。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40岁

①5月，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去安阳视察殷墟挖掘情形。此次是安阳最大的一次挖掘，参加者三百多人，出土了大量文物，伯希和对挖掘成果大为赞叹。

②9月15日，子仁轨生。傅斯年为爱子取名仁轨，其原因是为纪念唐代在朝鲜打胜日军的刘仁轨。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的强烈民族意识。

③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斗争，反对日本所鼓吹的华北特殊化。有一次北平市长宋哲元、幕僚长肖振瀛举行招待会，肖在会上要教育界闭口，少发议论。傅斯年慷慨陈言，痛斥肖

振瀛，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他的讲话振动了北平教育界。

④2月，丁文江在衡阳煤气中毒，移往长沙救治，傅斯年赶往长沙探视和护理。

⑤这一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独立评论》、《大公报》、《国闻周报》上发表的论文有：《夷夏东西说》、《明清史料复刊志》、《中日亲善??!》、《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10篇文章。傅斯年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注重于先秦史，其《夷夏东西说》被人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余几篇多是他对时局发表的政论。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41岁

①傅斯年举家移居南京。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患病在上海，总干事朱家骅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因此受蔡的委托，傅斯年在主持史语所事务的同时，处理研究院日常事务。

②4月，筹备和主持研究院评议会。

③12月，西安事变发生，傅斯年不明真相，力主讨伐张、杨二将军。

④傅斯年这一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独立评论》及《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谁是齐物论之作者》、《北局危言》、《论张贼叛变》、《讨贼中之大路》、《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等十几篇。

其中前两篇是学术论文。所谓《论张贼叛变》、《讨贼中之大路》是对西安事变的观点与反应。后两篇是丁文江病逝后傅斯年发表的悼念文章。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42岁

①上海“八·一三”抗战时期，朱家骅作为浙江省主席赴浙江主持工作，由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②“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于庐山召集谈话会，傅斯年以社会名流参加，并应聘参加了随后设立的国防参议会，从此积极投身政治。

③秋，主持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西迁事务，将史语所迁至长沙圣经院。

④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西安事变之教训》。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43岁

①3月和7月，两次致蒋介石长函，反对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

②春，史语所迁至昆明，10月，又自昆明城内迁至郊外。

③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傅斯年担任参政员，赴汉口出席第一次参政会。

④10月，参加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国民参政会。

⑤12月山东聊城专员范筑先抗日战死，傅斯年知后写诗悼念，其中云：“立国有大本，亮节与忠贞。一死泰山重，再战独济清。父子英雄业，百世堪议刑”。表达了对范筑先烈士的敬意。

⑥在《中央日报》发表《波兰外交方向之直角转变》。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44岁

①在昆明主持研究所事务。

②2月—9月，参加第三、四次国民参政会。

③在《大公报》、《今日评论》上发表《地理与胜利》、《抗战两年之回顾》等文章。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45岁

①4月，参加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从秋天开始，再次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由于事务繁巨，患高血压病。

②冬，史语所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12月，继任第二届参政员。

③在《今日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性命古训辨证》、《中国音韵学研究序》、《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等文章。其中，《性命古训辨证》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提交的论著，分上下两卷，论述了许多哲学史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傅斯年的学术代表作之一。

1941年（民国三十年）46岁

①3月，患高血压病住院，七月出院。

②10月，其母李太夫人在重庆去世，享年75岁，傅斯年年幼丧父，事母至孝，其母去世后，心情悲痛，悼念不已。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47岁

①2月，傅斯年身体不好，又遭母丧，写信给胡适，对自己的几年行为进行反思。信中说：“我本已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决心以后以著书为业。

②7月，继任参政员。10月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议。

③12月，写《大明嘉靖三十三年大统历跋》。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48岁

①9月，参加第三届二次参政会。

②此年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盛世危言》、《战后建都问题》、《丁鼎昌七十寿序》等。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49岁

①6月，为其子傅仁执书《文天祥正气歌》及《衣带赞》等诗，在跋中叙述了其写条幅的用意是培养儿子的正义感。

②9月，参加参政会三届三中全会。

③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天朝——洋奴，与邦协和》、《“五四”二十五年》、《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现实政治》、《第二战场的前瞻》等，都是对政治和时局发表的评论。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50岁

①4月，出席参政会，继任第四届参政员。

②6月，与黄炎培会见蒋介石，提出去延安为国共和谈斡旋，得到蒋的同意，为去延安作准备。

③7月1日，与黄炎培等人代表参政会访问延安，商谈团结。5月，返回重庆并向蒋介石递交了延安会谈记录。在延安期间由于和毛泽东熟悉，曾单独同毛泽东同志谈了一个通宵，就国内外形势和团结建国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④7月7日，参加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据记载：他每次在参政会上发言建议，均以促请政府整刷政风为主，此外在会中竭力反对违背科学之提案。

⑤8月初，在《大公报》上发表《黄祸》一文，响应国民党政府征收黄金存户之部分黄金。

⑥8月10日，日本投降。傅斯年极为兴奋，以至于带酒到街上去喝，载歌载舞。

⑦8月，致书蒋介石，坚决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推荐胡适任此职，由于胡适在美未归，任北大代理校长，负责北大

迁校复员之事。在北京大学复员过程中，坚持不收留伪北大汉奸。

⑧8月——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傅斯年等拜会了毛泽东，并设宴款待。

⑨12月，西南联大学生运动，傅斯年以校务委员身份前去处理，在写给夫人的信中承认地方当局的荒谬。

⑩发表的文章有：《殷历谱序》、《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评英国大选》等。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51岁

①1月，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②3月，国民党政府打算让傅斯年担任政府委员，傅斯年坚持不就。在给蒋介石的推辞信中说：“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招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指学术研究），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③5月4日，由重庆飞往北平，办理北京大学迁校事。在复员过程中，傅斯年发表声明，坚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遭到伪职人员的抵制和反对，傅斯年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

④7月，胡适回国。9月，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辞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务，返回南京。

⑤冬，把史语所由四川迁回南京。11月，出席所谓首届制宪国民大会。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52岁

①2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对宋子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举国瞩目，宋子文不得不辞职。

②6月挈妻子去美国治疗高血压。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53岁

①到美国后先入波士顿白利罕医院治疗，住院三四个月后，血压大致正常，出院移居新港静养。

②在美国治疗期间，国内进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傅斯年通过书信陈述了自己对选举方式和院士标准的意见。并于此次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③国民党立法委员选举，傅斯年当选为立法委员，傅斯年曾一度推辞，最后接受任职。

④8月，由美回国，主持史语所所务。

⑤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

⑥冬，迁史语所于台湾杨梅镇。

⑦11月，解放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战和未定。傅斯年四处奔走，想把在北平的同事和学者接出北平，毛子水、陈寅恪和钱思亮等人先后被接出。

⑧在史语所集刊发表的论著有：《后汉书残本跋》、《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跋》、《论美苏对峙之基本性》等。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54岁

①1月，去台湾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②傅斯年在《自由中国》杂志，台湾大学校刊及台湾新生报发表之论著主要有：《自由与平等》、《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之解释》等篇。

③台湾大学原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所办的大学，也是日本奴化台湾人民的工具和基地。因此，台湾大学在教育思想、方针和设备等方面都有严重的陋规和弊端。傅斯年出任校长后，

曾进行了一些改革。在这段时间里，傅斯年除了发表对时局的议论外，开始系统地探讨大学教育的一系列问题。

1950年（民国三十九年）55岁

①主持台湾大学校务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务。在此期间对台湾大学进行的一些改革，符合师生要求，受到师生的拥戴。

②傅斯年在台湾《自由中国》、《中央日报》、《大陆杂志》等报刊发表的论著主要有：《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关于台大医院》、《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等，针对台湾大学，对学校教育制度及方式进行了探讨和论述。

③12月20日，傅斯年参加省议会，答复有关教育行政的咨询。议员郭国基提出台湾大学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傅斯年对此进行了认真回答。尤其是强调大学招生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放低标准。回答用了三十多分钟，有些激动。下台时步履不稳，昏了过去，抢救无效，于当夜去世。

④12月21日，傅斯年遗体暂厝极乐殡仪馆。台湾大学暂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送往火葬场火化。

12月31日，治丧委员会及台湾大学借台大法学院大礼堂举行追悼会，各届前往致祭者达五千余人，共致送挽联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中西文悼唁函电90余封。

后 记

傅斯年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并曾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爱国者和社会活动家，在现代史上有广泛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几十年来，傅斯年已逐渐被人淡忘。但故乡人民并未忘记这位著名人物，近年来先后两次召开了傅斯年学术讨论会，并为之修建了傅斯年陈列馆。为了配合陈列馆的开放，更是为了促进人们对傅斯年的了解，我们编写了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岳玉玺、李泉、马亮宽三位先生所著《傅斯年》一书，在此谨表谢意。另外，由于篇幅所限，书中所叙未尽详细，好在书后所附《傅斯年先生著述简谱》甚为完整，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傅斯年先生。

编者

1997年3月